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terie Journals” and Society-based Literary Schools: A Case Study of *The Crescent Moon*

Luo Xiaoj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rescent Moon* monthly magazine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variations in modern Chinese cultural ecology, the patter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society-based literary schoo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terie Journals”, “Coterie Literature”, and “Coterie Culture”. “Coterie Journals” can be regarded as “Coterie Media”- an independent, autonomous and folk “collective media” in contrast to highly organized and corporate media. Through the entire thirty year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oterie Journals” have experienced a period of prosperity and diversification, a decline period with noticeable “semi-coteriezation”, and a stage of development when their “legitimacy” eventually disappeared. The media operations and dissemination activities of *The Crescent Moon* magazine typically reflect the inherent connections and interaction methods between modern Chinese “Coterie Journals”, the generation of literary schools and literary production.

Key words: “Coterie Journals”; *The Crescent Moon* monthly magazine; Society-based literary schools

“同人期刊”与社团流派关系研究： 以《新月》为例

罗晓静

摘 要：本文以《新月》月刊为例，从“同人期刊”乃至“同人文学”“同人文化”角度，阐

作者简介：罗晓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潮、文化传播。

课题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中国文化传播的类型、模式和机制研究”（13BZW142）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引用：罗晓静：“同人期刊”与社团流派关系研究：以《新月》为例[J]．中国新闻评论，2023，4（2）：110-127.

<https://doi.org/10.35534/cnr.040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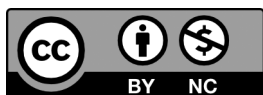
释现代中国文化生态的变异以及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发生的规律和特点。“同人期刊”可谓之为“同人媒介”——一种与高度组织化、企业化媒介相对而言的，具有自主、自治和民间色彩的“群体性媒介”。就贯穿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同人期刊”来说，经历了繁盛和多元化时期、具有明显的“半同人化”性质的式微时期，以及“合法性”最终消失的阶段性发展。《新月》月刊的媒介运作、传播活动，比较典型地体现了现代中国“同人期刊”与流派生成、文学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方式。

关键词：“同人期刊”；《新月》月刊；社团流派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同人期刊”是现代中国文化、文学史，尤其是社团流派史上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对现代中国“同人期刊”历史发生的研究，既涉及当时社会、文化、媒介、法律等基本面的变化，也涉及现代“同人”的出场——即现代知识分子由个体而至群体的一种“亚组织”或“结盟”现象。“五四”前后一大批“同人期刊”的出现——从《新青年》《少年中国》《创造》到《新月》等，即为这一现象在媒介乃至传播方式上的体现。就《新月》月刊而言，一方面，它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亚组织”或“结盟”现象的产物；另一方面，它又在后期新月派的演化发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新月》月刊以其时间跨度长、独具特色和影响广泛而尤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一、“同人期刊”的理论阐释

“同人期刊”作为现代中国文化文学史上的突出现象，尽管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但对“同人期刊”做出理论的界定和阐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量相关的研究著作或论文中，“同人期刊”被当作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就笔者所见到的关于“同人期刊”的定义，主要有如下几种：

《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说：“‘五四’运动以后，所有的文化阵营刊物，差不多都是同人杂志。以几个人为中心，号召一些志同道合的合作者，组织一个学会，或社，办一个杂志。每一个杂志所表现的政治倾向、文艺观点，大概都是统一的。当这一群人的思想观点发生了分

歧之后,这个杂志就办不下去。”^①这段描述成为经典并被相关研究者反复引用。郭沫若提到:“同人杂志的刊行,国内近来似乎渐渐发达了……《青年文艺》的内容一定可以使我满足无疑,我这是据同人杂志的性质上来下的断案。文艺是迫于内心的要求之所表现,同人杂志正是应乎这种要求的表现机关,所以它的内容当然和坊间专以推广销路为目的的刊行物不可同日而语了。”^②郭沫若主要强调“同人杂志”是应文艺表达内心的要求而产生,不以销售广泛为目的。编辑赵家璧曾回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期刊盛况,认为当时各种书店出版的可以说都是同人刊物。他总结这类刊物的产生有几种形态:一种是“几位作家意气相投,政治和文艺观点相同或相似,就结合起来找个出版商编个期刊”,一种是“出版商想出版一种文学期刊以资号召而去找一位或几位著名作家来担任编辑”,更多的是“自己几个人凑钱办;或找个不懂文艺的经商的亲戚朋友当后台老板”。“期刊的编辑或核心作家,都有他所熟悉的有联系的作家,这些作家当然都是志同道合的居多;但也有许多例外,为了个人交情,为了敷衍某一方面的关系,也有有权势者所介绍的。”他特别指出:“有的看来是个同人刊物,作者各有见地,却是个松散的集合体,情况复杂。所以文学研究者如果以我们今天的目光,简单地凭人划线,对某些现象就不易理解,势必需要另找答案。”^③由此可见,对“同人刊物”性质的判断颇有难度。

陈平原认为清末民初的报刊大致形成了“商业报刊、机关刊物、同人杂志三足鼎立的局面”,同人杂志“既追求趣味相投,又不愿结党营私,好处是目光远大,胸襟开阔,但有一致命弱点,那便是缺乏稳定的财政支持,且作者圈子太小,稍有变故,当即‘人亡政息’”。他谈到陈独秀心目中的理想杂志须具备两大特征:一是“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一是“有一定的个人或团体负责任”^④,前者凸显同人杂志的精神,后者指向同人杂志的形式。刘增人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将现代文学期刊的办刊模式划分为三种,分别是党派性期刊、商业性期刊与文人性期刊,其中文人性期刊包括了“同人刊物”和“非同人刊物”。他比较鲁迅和茅盾所办刊物时提到,鲁迅系列文学期刊一般为同人刊物,其初衷“就是为了摆脱商人的制约,但刊物的生存时间一般较为短暂”;茅盾系列文学期刊“一般都依托某一强大的出版集团,存在时间久长,影响自然也较大”^⑤,但会受到出版商人的制约。这里特别强调资本独立对“同人刊物”的决定性作用。他概括了鲁迅所谓的“编辑要独裁”的编辑立场:其一,“必须贯彻自己的主张”;其二,“尊重读者,而决不俯就读者”;其三,“团结作者,而不迁就作者”;其四,“注重与书店即出版商的合作,而决不忍气吞声无原则地接受他们的辖制”;其五,“对于政府的禁删、扼

① 施蛰存.《现代》杂忆(一)[J].新文学史料,1981(1).

② 郭沫若.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他[J].创造季刊,1922,1(2).

③ 赵家璧.现代文学期刊漫话·序[M]//应国靖.现代文学期刊漫话.花城出版社,1986:1-2.

④ 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上)[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3).

⑤ 刘增人.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上册[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50.

杀政策，决不妥协，决不屈服，一息尚存，反抗到底”^①。鲁迅的这种编辑立场代表了当时很多同人办刊物的态度。崔波在《清末民初媒介空间的演化论》一书中专门论述“媒介的在地化——同人报刊”：“所谓同人报刊，就是指从筹建、创刊、撰稿，到确定编辑策略和用稿方针等诸多方面，基本上是由一个相对固定的团体来完成的。按照通行的规则，刊物的编辑对于同人的稿件没有选择的权利，一般要求来稿必登。因此，这个团体大部分人的兴趣和意志，也就决定了刊物的性质和归属。这部分刊物对于自身观点的纯粹性较为看重，力图将其经营成独领风骚的‘自己的园地’。”^②这应该是对“同人报刊”比较全面的界定。张新民在《期刊类型与中国现代文学生产（1917—1937）》一书中区分了“社团期刊”与“同人期刊”，他以“是否有结社的愿望及其为之进行的期刊运作”^③作为两者之间重要的区别。“社团期刊”被界定为“团体主导的文学生产”，以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系列期刊为例；“同人期刊”则界定为“编辑主导的文学生产”，以《语丝》、徐志摩编辑的文学期刊、“京派”文学期刊和《文学杂志》为例。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社团期刊”与“同人期刊”之间的界限模糊，界定起来是极为困难、极为复杂的事情。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就能指来说，“同人杂志”“同人刊物”“同人报刊”“同人期刊”等多种提法共存。就所指来说，情况则更为复杂。

首先，同一本刊物，究竟是不是“同人期刊”，有的需要作出历时的观察和判断，有的则很难得出统一的结论。

以《新青年》为例。《新青年》从1918年1月（即第四卷）开始的“同人期刊”定位，在研究者那里基本达成共识。其重要根据在于，《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登载编辑部启事称：“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④但在此之前，它能否被纳入“同人期刊”的范畴，学界看法并不一致。如王晓明将1918年1月之前的《新青年》主要看作陈独秀的个人刊物。陈平原则认为“《新青年》从来不是个人刊物，始终依赖众多同道的支持”，因为“到第2卷结束时，日后名扬四海的《新青年》，其作者队伍已基本成型”^⑤。陈万雄指出“《青年杂志》的初办是以陈独秀为首的皖籍知识分子为主的同仁杂志”，“从第二卷起，《新青年》已突破了皖籍作者为主的局面，作者群大为扩大。虽则如此，以迄于第二卷结束，该志‘圈子杂志’的色彩仍旧浓厚，因该卷作者与主编陈独秀大都是熟稔和有一定交谊的朋友”^⑥。至于1920年下半年以后的《新青年》如何定位，王晓明和陈

① 刘增人.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上册 [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36-40.

② 崔波. 清末民初媒介空间演化论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35-136.

③ 张新民. 期刊类型与中国现代文学生产（1917—1937）[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01.

④ 本志编辑部启事 [J]. 新青年，1918，4（3）.

⑤ 陈平原. 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上）[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3）.

⑥ 陈万雄. 五四新文化的源流 [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

平原的观点显然也是有差异的。王晓明认为：“从1920年下半年起，《新青年》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小组的机关刊物。”^①但在陈平原的研究视野里，1920年下半年到1923年之间的《新青年》，仍可以被当作“同人期刊”来对待。

再如《现代》杂志。其《创刊宣言》开宗明义地说：“本志是普通的文学杂志，由上海现代书局请人负责编辑，故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②主编施蛰存1980年所写的《〈现代〉杂忆》里，强调了不办同人杂志的初衷和贯彻情况：“我和现代书局的关系，是雇佣关系。他们要办一个文艺刊物，动机完全是起于商业观点……我的《现代》绝不可能办成一个有共同倾向性的同人杂志。因此，我在《创刊宣言》中强调说明了这一点。我主编的各期刊物的内容，也充分贯彻了这个精神。”^③施蛰存的宣言和态度，显然并没有被所有人接受，对于《现代》的办刊模式早就众说纷纭。《现代》杂志同时期的读者对于《现代》“总爱用同人杂志的尺度来衡量”。当下的研究者，有人以毫无疑义的态度将《现代》杂志列入“同人期刊”的目录中；有人注意到了主张和现实之间的悖论，通过对该杂志作者群构成特点的分析，得出“这些人是《现代》的‘同人’，正是这些同人，使《现代》成了一本不是同人杂志的同人杂志，而这些人，也就成了不是同人的同人”^④的结论；朱晓进考察20世纪30年代杂志面对的生存竞争问题，指出“许多文学杂志主办者争取读者的考虑往往超越了他们对同人性质的追求”，如施蛰存、杜衡、戴望舒等人创办《现代》杂志就“并未向‘同人杂志’的方向发展”^⑤。这就意味着，主编施蛰存否定《现代》杂志的同人性性质，读者期待则与之相反，研究者和研究者之间对刊物性质的认识又是有分歧的。

其次，每一个“同人期刊”在媒介构成和机制上既有同一性，也有其差异性。因此，任何类型化、总论式的概括都不可能适用于所有的这一类刊物。

以资本和管理为例，“同人期刊”获得独立性的前提和保障，便是资金的独立。因此，大多数“同人期刊”以在同人群体中集资或集股的方式独立经营。然而，例外的状况总是存在。如《新潮》杂志，它被归入“同人期刊”的范畴基本没有分歧意见。《新潮》的编者和作者具有一体性、新潮社员之间兴趣爱好相同或相似、刊物风格稳定等，都显示出刊物的同人性性质。值得注意的是，《新潮》杂志资金上尽管是独立的，但办刊经费由北京大学校方资助，其资金来源直接相关于《新潮》创办者为北京大学的学生这一特殊性。同样依靠外来资金的《创造》季刊，又与之形成差异，它依托民间资本试图相对独立运作。郭沫若等人之所以愿意与泰东图书局合作，是看中了彼此

① 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M]//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190。

② 创刊宣言[J]。现代，创刊号（1932年5月）。

③ 施蛰存。《现代》杂忆（一）[J]。新文学史料，1981（1）。

④ 张永胜。试论《现代》杂志作者群的构成特点[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⑤ 朱晓进。论三十年代文学杂志[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

之间达成的较为松散的雇佣关系。正如创造社同人描述所说，创造社没有一个人靠泰东书局生活，因而也不受书局的拘束，写作态度比较自由，言论的胆量也大。但泰东既然为《创造》季刊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因为政治观念的差异与分歧也不可避免会造成经济上的冲突和压迫。郭沫若回忆说：“这些饭和这些钱是主人的恩惠，我们受着他的买活，便不能不尽我们奴隶的劳力。”^①这种尖锐的经济利益冲突，只能以结束合作关系的方式来解决。其后，郭沫若显然吸取了这个教训。1925年5月12日出版的《晨报副刊》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关于创造周报的消息》的文章，也是郭沫若写给“LT”的公开信，其中说到将周报和季刊合并成月刊出版的想法，资金上由自己募股来举办。所以，有商业背景的刊物未必不是“同人期刊”，如上文所说就连施蛰存有意强调《现代》杂志的商业背景，但读者和研究者还是会将之看作“同人期刊”；但商业资本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同人期刊”的自由发展和存在周期。当然，靠集资或集股运作的“同人期刊”，又往往因为资金不充足摆脱不了持续时间短暂的宿命。

在编辑方针和作者队伍方面，“同人期刊”的差异性也显而易见。如上文所提到的《创造》季刊，是一个公认的同人社团的“同人期刊”，主要由郭沫若、郁达夫和成仿吾轮流编辑而成。其同人圈子比较确定，包括田汉、成仿吾、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郑伯奇和穆天木等。但是《创造》季刊的作者有23位并非创造社成员，诸如黄业初、袁家骅、方光焘、谢康、闻一多、梁实秋、张定璜、张友鸾、黄慎之、冯至、徐志摩、刘梦苇、王环心、王珏、楼建南、顾庆、施若皇、叶宗泰、朱公垂、赵邦杰、冷玲女士、淦女士、王怡庵，其数量占到季刊作者总数的一半之多。由此可见，不同于《新青年》从第四卷起“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创造》季刊不仅仅局限在一个小圈子内供同人之间互相唱和，而是有着相当程度的开放性^②。

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对“同人期刊”的内涵和外延予以较为科学的界定，从而厘清其构成要素和基本性质。笔者在此持较为宽泛的看法：“同人期刊”可谓之为“同人媒介”——一种与高度组织化、企业化媒介相对而言的，具有自主、自治和民间色彩的“群体性媒介”。在资本、体制和管理上，它们或以集资或集股方式独立经营，或依托民间资本、机构而相对独立运作；在媒介组织、媒介事务上，它们或自由组合、集体协商，或合同管理、分工负责；在办刊宗旨、编辑方针上，它们多强调社团目标和群体追求，而不以政党原则或企业利益取舍等；在传播者的身份、意识上，编辑主体和创作主体之间有着高度的统一性，而且表现出浓厚的精英意识；在受众的定位、构成上，它们持非读者主导的态度，且往往对受众做出类别化和次群体化的选择。

① 郭沫若. 创造十年 [M] //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151.

② 张勇. 1921—1925：中国文学档案——“五四”传媒语境中的前期创造社期刊研究 [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5-6.

二、“同人期刊”的历史发生与阶段性特征

现代中国“同人期刊”的历史发生，从大的背景而言，可以追溯到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以及现代印刷媒介的兴起。从直接的条件和成因来看，相关于清末民初社会文化控制的松动，尤其是新兴知识分子阶层和群体的产生。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崩溃和衰落过程，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时代。一切社会秩序，包括政治制度、社会礼俗、道德规范、价值观念等，均已显得百孔千疮、难以为继。以“变”为前提，中国人开始认真地睁眼看世界，对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寻求，并开始了早期现代化的要求和尝试。这场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与现代印刷媒介的兴起和发展，有着相互相生的关系。报刊作为一种全新的传播媒介，晚清时期首先由传教士引入我国，迅速成为文化传播的有力工具，改变了文学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整体的文化生态。作为新的表达和传播渠道，现代报刊与传统书籍相比，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能够进行群体表达。正如麦克卢汉所说：“书籍是一种个人的自白形式（Private Confessional Form），它给人以‘观点’。报纸是一种群体的自白形式（Group Confessional Form），它提供群体参与的机会。”^①从魏源开始，报刊已经被视为允许百姓参与的带有公共色彩的意见交换系统，“刊印逐日新闻纸，以论国政，如各官宪政事有失，许百姓议”^②。由于其媒体属性，报刊上的言论逐渐转向社会并诉诸大众。这种“面向不特定人群且带有平等色彩的大型意见表达和交换系统”，它“既带有西式现代出版的形式，又隐含着本土古典政治上下沟通的理想”^③，从而迅速吸引了中国知识精英的进入。

中国的知识精英在报纸杂志出现后，很快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性并投入到新兴的宣传事业中。尤其是戊戌维新之后，这些人居于主流政治话语中心之外，只能通过报刊的公共书写和传播方式来表达政治理想并最终实现其政治抱负，所谓“在野之有识者，知政治之有待改革，而又无柄可操，则不得不藉报纸以发抒其意见，亦势也”^④。与此同时，随着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以现代工商经济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和市民阶层迅速崛起。一般市民受教育的程度，包括阅读能力逐渐提高，媒介产品的丰富性和可接近性的增加，遂使得新的文化、文学思想影响日益广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报刊与社团开始形成异常紧密的关系，很多时候甚至合二为一，两者互相依托，开辟了知识精英交往和行动的新平台。知识分子团体需要建构自我舆论空间和表达独立思想，创办属于自

① [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增订评注本》[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234。

② 魏源：《英吉利国广述上》[M]//《海国图志》：卷五十一，长沙：岳麓书社，1998：1421。

③ 李礼：《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1872—1912）》[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22。

④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176-177。

己的刊物就成为最佳途径之一。随着出版物数量的不断攀升和影响力的迅速扩大，一个现代期刊追求并保持其独立意识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同人期刊”遂得以大量出版发行。

如前所述，《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说过：“‘五四’运动以后，所有的新文化阵营刊物，差不多都是同人杂志。”^①施蛰存的这段论述成了经典，所以很容易造成一个印象，“同人期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实际上，一方面，“同人期刊”并不是“五四”运动以后才出现的，陈平原就曾指出“晚清数量极多的同人杂志”^②；另一方面，除新文化阵营之外，非新文化阵营也有很多“同人期刊”，如胡先骕、梅光迪、吴宓等人于1922年1月在南京创办的《学衡》杂志，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是一本以极鲜明的态度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同人性质的刊物。综合以上说法，从大的历史分期来看：“同人期刊”从“五四”运动前后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都大量存在，是中国现代文化、文学生产与传播实践中一种非常普遍的形式和方式；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作家逐步体制化，文学生产和传播的日益组织化，“同人期刊”的合法性逐渐消失。

就贯穿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同人期刊”来说，仍然存在阶段性特点。刘忠在《同人期刊的知识谱系及文学史评价》^③这篇文章中，将“同人期刊”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五四”前后为第一个阶段，是“同人期刊”的多元化时期。20世纪30年代前后为第二个阶段，是“同人期刊”的普罗化时期。笔者认为这样的分期基本合理，但对其阶段性特征的概括有混乱之处。因为对“同人期刊”而言，主要强调它与党派性期刊、商业性期刊的区别，“普罗化”并不是对“同人期刊”作出界定的标准。具有普罗化色彩的期刊可能是“同人期刊”，也可能是党派性期刊。刘忠在他的另一篇文章《自由撰稿人、同人社团和期刊的互动关系》^④中的概括更为准确，“五四”前后是同人社团和刊物的“自由化”“多元化”时期，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是社团和期刊的“半同人化”“商业化”时期，这就揭示出了“同人期刊”逐步受商业因素影响和意识形态规训的演变特征。就笔者目前所见，除上述刘忠的论文有所涉及之外，鲜有对“同人期刊”做综合性、整体性研究的显著成果，因而“同人期刊”的历史谱系基本上是模糊不清的。结合学界已有的零散成果，笔者在此尝试对“同人期刊”的阶段性演化及其特征进行初步梳理。

第一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即“五四”前后（1917—1927年），是“同人期刊”的繁盛和多元化时期。这一时期“同人期刊”的特点大致可以归结为：在编辑原则上充分展示团体意志，政治性背景逐渐淡化，经济上尽量摆脱外向依赖，自由多元的办刊姿态等。

“文学革命”之初，《新青年》《新潮》《创造季刊》《沉钟》《浅草》《晨报·副镌》

① 施蛰存.《现代》杂忆（一）[J].新文学史料,1981（1）.

② 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上）[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3）.

③ 刘忠.同人期刊的知识谱系及文学史评价[J].学术研究,2013（2）.

④ 刘忠.自由撰稿人、同人社团和期刊的互动关系[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

等报刊先后成为知识分子传播思想和文学创作的重要阵地。据汪孟邹回忆，政治上屡遭失败的陈独秀认识到文化启蒙的重要性，“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①，这就有了《青年杂志》的创办。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在筹组创造社过程中也有类似的共识：“有了杂志才有‘社’，杂志是‘社’的凝聚力之所在，杂志是‘社’的形象的体现，杂志是使‘社’立足于中华文化界的唯一方式，杂志几乎就是‘社’的一切。”^②刊物不仅对于创造社如此重要，对于五四时期其他社团及作者群也同样重要。正是在众多同人期刊的支撑下，新文学才会在短时间里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呈现出多元开放姿态。“五四”新文学多元与多维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说，正是由“同人期刊”催生的。

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提及，到1925年底，同人社团和刊物“不下一百余”。在北平有鲁迅、周作人、孙伏园、钱玄同、川岛等人组成的语丝社，出版《语丝》周刊；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罗石君、杨晦、冯至等人组成的浅草社，出版《浅草》季刊；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等人在鲁迅支持下组成未名社，出版《莽原》周刊、《未名》半月刊。在上海有欧阳予倩、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发起成立的民众戏剧社，出版《戏剧》月刊；胡山源等人组成的弥洒社，出版《弥洒》月刊；田汉创办的南国社，出版《南国》半月刊。天津有赵景深、焦菊隐等人组成的绿波社，出版《绿波》旬刊。杭州有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组成的湖畔诗社，出版《湖畔》。长沙有李青崖等人组成的湖光文学社，出版《湖光》半月刊。武昌有刘大杰等人组成的艺林社，出版《艺林》旬刊。这些社团和刊物的成员多为作家、学者和青年学生，相同或相似的文学主张、审美兴趣、创作理念等让他们走到了一起。虽然因为时代、人际、观念等因素，同人们聚散离合，但不管怎样，他们的创作对建设期的新文学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如茅盾后来总结的那样：“这几年的杂乱而且也好像有点浪费的团体活动和小型刊物的出版，就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那狂猛的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已经练得一付好身手，他们的出现使得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顿然有声有色！”^③

这一阶段的“同人期刊”有着鲜明的校园背景。现代社会中，大学是较大程度上保留了开放性与自主性的文化机构，在这里人们比较容易找到支持自己观点和看法的同好；而且教书育人是独立于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谋生的主要手段，他们往往在收入上比较宽裕，因而可以不考虑经济利益承担刊物的编辑、撰稿和出版工作。尤其是北京大学，《新青年》之所以能够所有撰译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正是因为有北大教授群体作为有力支持。“主编陈独秀被礼聘为北大文科学长，使一校一刊完美结合，大大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进程”^④，关于这一点，当时在北大读书的冯至有过生动

① 汪原放. 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6: 33.

② 刘纳. 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 [M].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9: 3.

③ 茅盾.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M] //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 影印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

④ 颜浩. 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 1920—1928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8.

回忆：“每逢星期日早晨起来，便听见报童们在街上奔跑叫卖，花两三个铜板买来一份周刊，就能很有心得地度过一个上午。因为这些小型周刊的撰稿人主要是北大的教师和个别的学生。他们通过这些刊物跟读者见面，无拘无束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和感想，生动活泼，读起来很亲切。”^①冯至所说的是1924到1926年间相继创办的《语丝》《现代评论》《猛进》等同人性质的刊物。这种独特的校园环境和舆论氛围，为五四时期的“同人期刊”提供了最可靠的支撑。

第二个阶段：20世纪30年代（1928—1937年），是“同人期刊”的式微时期，具有明显的“半同人化”性质。此时，“同人期刊”本身的缺陷逐步显现，如存在周期短、同人圈子的封闭性等。所以，“刊物在持守人学内涵和审美属性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超越同人范围，接纳文学观念和价值立场不同的作家，力求在审美与市场之间取得平衡，兼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抗战等多方面功能”^②。这一阶段的“同人期刊”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同人趋于分化、商业化渐强、普罗色彩浓厚、意识形态对社团同人的规训与整合不断强化。

一方面，因为文化中心南移至上海，上海的开放性和商业化特征使得文学杂志的商业性质逐步取代了同人性质。期刊进入一个靠竞争力生存的环境，市场和读者的需要，对于杂志来说理所当然比同人追求更为重要。如《语丝》杂志最初的做法是“对于广告的选择是极严的，虽是新书，倘社员以为不是好书，也不给登载。因为是同人杂志，所以撰稿者也可行使这样的职权”，但移到上海出版后，“书籍不必说，连医生的诊例也出现了，袜厂的广告也出现了，甚至于立愈遗精药品的广告也出现了”^③。鲁迅作为编辑虽然被读者写信诘责，但他的立场其实和读者一致。他一边在《语丝》上登了一篇读者投来的反对文章《建议撤销广告》，一边就广告事情质问北新书局负责人李小峰。鲁迅回忆道：“当袜厂出现时，曾经当面质问过小峰，回答是‘发广告的人弄错的’；遗精药出现时，是写了一封信，并无答复，但从此以后，广告却也不见了。”^④在鲁迅看来，李小峰算是做了让步，但此时的《语丝》杂志已经并非纯粹的“同人期刊”了，《语丝》的部分作家已经开始从北新书局取得稿费。另一方面，“同人期刊”普罗色彩渐浓，为了逃避国民党文化审查，刊物频繁更名。1930年代初，仍然以“同人期刊”名义出现的杂志，一面是左联系列的《前哨》《北斗》《萌芽》《拓荒者》《十字街头》等，一面是国民党政府出资、国民党政府官员编辑的《前锋月报》《前锋周刊》等，双方都并不讳言政党的背景。“同人期刊”的“半同人化”特征十分突出。

这一阶段“同人期刊”的生存空间逐渐缩小，而且生命周期普遍短暂。从《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的创办，到《萌芽》《拓荒者》《七月》的兴起，同人们在逐渐分化，同人期刊的生存空间缩小。《文艺新闻》《现代》《骆驼草》《文学杂志》等一方面宣称独立的同人立场，“不拘

① 冯至. “但开风气不为师”——记我在北大受到的教育[M]//刘琅, 桂苓. 记忆: 旧时月色前朝影. 中国友谊出版社, 2005: 329.

② 刘忠. 自由撰稿人、同人社团和期刊的互动关系[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1).

③ 鲁迅. 我和《语丝》的始终[M]//鲁迅全集: 第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175.

守于某一种的主义；不依附于某一种的集团；不为任何的个人或流派；不专为有特定作用的任何事象；凡是属于大众的，为大众所需要的——有文艺的新闻价值的一切，皆为文艺新闻工作的对象”^①；另一方面也一再声称“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②。因此，20世纪30年代许多期刊迫于竞争压力，往往超越同人界限，借普罗、革命等政治诉求来扩大读者群，增加发行量。如《现代》在保有“作家大集合私愿”的同时，对革命报以同情与宽容，客观上保持了“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立场。京派刊物《骆驼草》《文学杂志》固守“乡村梦影”的保守主义，间或也能见到来自“左翼”、海派阵营和巴金、老舍、曹禺等独立作家的稿件。

第三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前后，“同人期刊”逐渐式微，其“合法性”最终消失。抗战爆发后，由于战争的巨大左右力量，现代中国以文人办刊为主导的模式趋于崩溃，救亡的紧迫使得“同人期刊”数量锐减。刘增人在《四十年代文学期刊扫描》^③一文中，分析了20世纪40年代文学期刊办刊模式的多样化特征，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洋人”办刊。第二种是百货商人办刊的新模式，这两种主要出现在上海“孤岛”时期的杂志界。第三种是政党办刊，主要由边区党政机关在延安及根据地创办。第四种是联合办刊，主要是1937年全面抗战之后，各个社团、刊物放弃自己的招牌自费联合办刊，显示出国事为重、共赴国难的胸怀和气度。社会现实和文化环境的特殊性，对于“同人期刊”显然造成了弱化和限制的结果。

此后，出版界“同人期刊”的零星存在，是作为异质性的事物出现的。如以胡风为主先后创办的《七月》（1937年8月）和《希望》（1945年1月）杂志，创刊之初就明确了它们的同人性，是文艺态度接近的作家的文艺阵地，其主要撰稿人大都是被称为“鲁迅派”“胡风派”的作家。因为坚守文学本位和个性思维的立场，与整个文学界“服务于抗战”的共同趋向相疏离，刊物及其主办者在40年代文坛上呈现出卓异姿态，也埋下了日后被批判的伏笔。新中国成立后，胡风在回忆录中表达了自己的困惑：“这种在‘五·四’时代是平常现象，但现在却成了特殊现象，于是‘七月派’‘胡风派’的称呼就渐渐出现了。这还是文艺领域上不足怪的现象，但新中国成立后到了周扬等人的口中，就变成了‘小集团’，成为革命组织内破坏纪律的政治活动的团体了。”^④“同人期刊”的合法性在这个阶段已然虚弱。

1949—1952年间，尚有十余种“同人期刊”，如茅盾主编的《小说》月刊、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沙鸥主编的《大众诗歌》、柯蓝主编的《群众文艺》，以及《大公报》《新民报》《文汇报》三家私营报纸的文艺副刊，可以说是“同人期刊”时代的尾声和余续。这些刊物虽然具有“同人”出身，但努力辩白摆脱“同人期刊”的定性。如《文艺生活》称：“我们这个杂志并非同

① 袁殊. 文艺新闻之发刊[J]. 文艺新闻, 1931(1).

② 施蛰存. 《现代》杂忆(一)[J]. 新文学史料, 1981(1).

③ 刘增人. 四十年代文学期刊扫描[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3(2).

④ 胡风. 我的职业病[M]//胡风全集:第6卷.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630.

人杂志，而是属于全体读者的。”^①《大众诗歌》的前身是1948年创刊的《诗号角》，编辑者署名为“北京大学三院诗号角社”，是一份学生刊物。1949年12月为适应形势，更名《大众诗歌》，并改由党员诗人沙鸥主编，但这样的举动并未完全消除其“同人”出身的嫌疑。1950年，《文艺报》接连三次借故点名批评《大众诗歌》，令沙鸥极为紧张，《大众诗歌》于当年自动停刊。《小说》月刊因有茅盾、周而复等先后编辑，坚持到1952年才告终刊。其他数种刊物，在1952年后，或告停刊，或改国营。同人社团从式微走向消亡，社团和作家逐渐体制化，报刊杂志成为宣传部门的窗口和喉舌。曾经盛行一时的“同人期刊”，遂成为逐渐消逝的风景。

三、“同人期刊”与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生成

在《新月》月刊和“新月派”的活动中，可以看到“同人期刊”这种独特的文化、文学生产方式的一些基本特点。“个人”因志同道合而结为“同人”；“同人”导致了“同人期刊”产生，并因之“出场”为有着自己声音和标识的文化文学群体、社团或流派。“同人”在与“媒介”的结合中，经由“同人媒介”“同人传播”而产生了形态各异的“同人文学”乃至“同人文化”。从这种意义上讲，“新月派”，作为一种文化文学派别，其传播学、文化学的本质，是一种“同人文学”乃至“同人文化”现象。这种独特的文学生产方式乃至结果又直接参与了现代中国文化生态的建构：个人表达、群体价值、公共空间乃至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构成了错综复杂的互动。正是在这样的互动中，现代中国“同人期刊”体现着自己独特的媒介功用与传播价值。

“新月派”的存在与否，历来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对当事者而言，他们大多不承认“派”的存在。如梁实秋就断然否认有所谓的“新月派”：“《新月》不过是近数十年来无数的刊物中之一，在三四年的销行之后便停刊了，并没有什么值得称述的。不过办杂志的这一伙人，常被人称作‘新月派’，好像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好像是有什么共同的主张，其实这不是事实。”^②《〈新月〉的态度》则宣称：“我们这几个朋友，没有什么组织除了这月刊本身，没有什么结合除了在文艺和学术上的努力，没有什么一致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③当事人对松散共同体的回忆有出入，甚至不承认从属于某个社团流派，多半起因于松散集会而形成的公共空间边界的模糊性。

但从1930年代开始，文坛上对“新月派”或肯定或否定的评价态度，都是以其流派属性为基础的。如1930年11月《民众评论》杂志刊载白茶的文章《罗隆基被捕与“新月派”》，明确指出近两三年中国政治言论界有“新月派”这一集团，是从文艺的集团转向政治方面的，“极

① 《复刊词》，《文艺生活》1950年新1号。

② 梁实秋. 忆新月 [M] // 梁实秋, 著. 陈子善, 编. 梁实秋文学回忆录. 岳麓书社, 1989: 105.

③ 徐志摩. 《新月》的态度 [J]. 新月, 1928 (1).

力歌颂资产阶级的文明”，主张“好政府主义”^①。1930年12月《展开》杂志发表慕陶的《新月派与左联派》一文，称“新月派”是“中国老牌纯粹资产阶级”^②的文学团体，其文学主张代表了中国压迫阶级的文学理论，猛烈抨击梁实秋关于文学无阶级性的观点是“悖乎事实”“荒谬绝伦”的。“新月派”对新诗的贡献，则得到比较普遍的认同。1933年唐也发表评论文章《略论新月派的诗》，认为“新月派对于新诗革进的努力是不容抹煞的，特别是关于诗的外形”^③。直到1946年，徐行还在《记新月派诗人闻一多》一文中充分肯定“新月派诗人如徐志摩、闻一多、陈梦家、朱湘之流”对于“新诗中兴之功，是不可抹杀的”^④。

新月同人的确是一个松散的群体，是否有“共同的主张”或“共同的理想”尚未达成一致，但《新月》月刊的存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新月派”的得名，也主要相关于此。茅盾在1934年10月谈文坛上新出现的几本“同人杂志”时提道：“我们文坛上自来就有以刊物名称区分派别的习惯，所谓‘新月派’就是这样被叫出来的。”^⑤在此之前，按照罗隆基1931年5月5日致胡适的一封信上所说，“新月派”似乎应该写作“《新月》派”才对。信中提到当时上海《民报》发表一篇文章称中国当前有三个思想鼎足而立，分别是“（1）共产；（2）《新月》派；（3）三民主义”^⑥。“新月诗派”的命名，也被认为“不是由于新月社，而是由于《新月》月刊”，因为“新月社没有诗，《新月》月刊才有诗”^⑦。石灵1937年在《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新月诗派》，开篇就反复强调《新月》月刊才是“新月诗派”得名的由来，并在总结新诗发展的历程时明确提出“有意识的规律运动，一直到新月派才算正式开始”^⑧。这都表明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坛上，“新月派”的存在获得了比较普遍的认同，而判断流派成型的依据主要是《新月》月刊。由此可见，“同人期刊”与流派生成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和互动。

新月同人的聚合活动开始得比较早，从最初的聚餐会到新月社再到俱乐部，但他们未打出任何文学流派的旗号，反而个人化特征十分显著。正如梁实秋强调“《新月》一批人都是坚强的个人主义者，谁也不愿追随着在别人之后”^⑨，胡适也多次表达“狮子、老虎永远是独来独往的，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结队”^⑩，徐志摩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⑪。饶孟侃则认为：“一个努

① 白茶。罗隆基被捕与“新月派”[J]。民众评论，1930，1（1）。

② 慕陶。新月派与左联派[J]。展开，1930（3）。

③ 唐也。略论新月派的诗[J]。上海邮工，1933，6（3）。

④ 徐行。记新月派诗人闻一多[J]。七日谈，1946（31）。

⑤ 惕若（茅盾）。书报述评：《东流》及其他[J]。文学，1934（3）。

⑥ 罗隆基致胡适（1931年5月5日）[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64。

⑦ 石灵。新月诗派[J]。文学，1937（8）。

⑧ 梁实秋。新月前后[M]//梁实秋，著。陈子善，编。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125。

⑨ 梁实秋。忆新月[M]//梁实秋，著。陈子善，编。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105。

⑩ 徐志摩。列宁忌日——谈革命[N]。晨报副刊，1926-01-21。

力文学的团体是最不能标榜什么共同的主义的，因为一个人有一个人自己的特性，一个人也有一个人和別人不同的兴趣，大家既然一旦结合起来，至多也只能希望彼此互相鼓舞，希望大家能够因鼓舞而多得一点贡献，并不能希望大家合作一个调子。”^①所以梁实秋才说：“《新月》一伙人，除了共同愿意办一个刊物之外，并没有多少相同的地方。”^②他们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同人群体，且因为共同的兴趣聚集于同一个“空间”，“同人期刊”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媒介功用。

事实上，当徐志摩以《晨报副刊》为阵地创办《诗镌》和《剧刊》的时候，新月社的文学活动才开始进入一个较为自觉的具有流派特征的时期。徐志摩与闻一多一起办刊物，各自的动机与目的有差异，但共同的信心是“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情做”，去发现“诗文与各种美术的新格式与新音节”^③。“新诗规律化”这种共同的倾向，正是新月诗得以成派的基础。直到《新月》月刊创刊，“新月派”才成为真正有着自己声音和标识的文化文学群体、社团或流派。创刊号上的《〈新月〉的态度》一文对“所谓现代思想或言论市场的十多种行业”予以抨击，打出了“健康与尊严”的旗帜。像这样旗帜鲜明地站在与现代思想、言论市场决绝的立场，表明“新月的态度”，这在新月同人的前期活动中是不曾见的，也不大符合徐志摩一贯的性格和处世风格。因此，《〈新月〉的态度》是新月派正式披挂上阵的信号。也就是说，正是自《新月》月刊创刊，新月派才正式跻身中国现代思想、言论和文艺“市场”，直接构成了同各种其他思想文化势力之间的对立。朱自清曾将之命名为“格律诗派”，主要是概括其诗歌创作的基本特征后进行的形象化表述；石灵的“新月诗派”之命名强调得名于《新月》月刊，反而在文学史上流传更广、影响力更大。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基本都采用了“新月诗派”来指称这个诗歌写作群。

新月同人在思想政治主张上有较大差异，如闻一多、饶孟侃二人未在《新月》月刊上发表过任何所谓“政治性”的言论，徐志摩的思想有很大的动摇性和不确定性，胡适、梁实秋等人政治信仰和观念则比较牢固、鲜明，因而被描述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萍踪偶聚”^④的一个群体。新月同人虽不以主义或思想“相号召”，却仍共享现代西方民主精神和“自由主义”思想，他们不以严密的政党组织为活动旨归，“群而不党”形成自由独立的共识，因此，当年左翼文艺界同新月派的斗争成为文坛上引人注目的文学事件。鲁迅曾指称“《新月》月刊团体”在其声明中“虽说并无什么组织，在论文里，也似乎痛恶无产阶级式的‘组织’，‘集团’这些话，但其实是有所组织的，至少，关于政治的论文，这一本里都互相‘照应’”；文艺则同样如此，用着“我们”，“颇有些‘多数’和‘集团’气味”。因此，鲁迅调侃“拿文艺批评界来比方罢，假如在‘人性’的‘艺术之宫’里，向南面摆两把虎皮交椅，请梁实秋、钱杏邨两位先生并排坐下，一个右执‘新

① 饶孟侃. 感伤主义与“创造社”[N]. 晨报副刊·诗镌, 1926-06-10.

② 梁实秋. 忆新月[M]//梁实秋, 著. 陈子善, 编. 梁实秋文学回忆录. 岳麓书社, 1989: 108-109.

③ 徐志摩. 诗刊弁言[N]. 晨报副刊·诗镌, 1926-04-01.

④ 梁实秋. 忆新月[M]//梁实秋, 著. 陈子善, 编. 梁实秋文学回忆录. 岳麓书社, 1989: 116.

月’，一个左执‘太阳’，那情形可真是‘劳资’媲美了”^①。鲁迅在这里强调的是，新月派是有共同的政治意识和文艺思想基础的，《新月》月刊无疑是新月派宣传共同主张的阵地。“《新月》派”被认为是与“共产”和“三民主义”并列的三个思想派别之一，以至于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查禁与压制，胡适也因发表系列政论文章招来国民党教育部的正式警告^②，也都是其来有自的。

新月同人在艺术见解上也不完全一致，比如对于新诗格律的认识差异，闻一多提出了现代诗歌史上著名的“三美”诗论，徐志摩却认为“谁要是拘拘的在行数字句间求字句的整齐，我说他是错了。行数的长短，字句的整齐或不整齐的决定，全得凭你体会到的音节的波动性……否则就容易陷入一种新近已经流行的谬见，就是误认字句的整齐（那是外形的）是音节（那是内在的）担保”^③，但新月同人在文学主张上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仍十分鲜明。《新月》月刊第一卷第一号除了宣言式的《〈新月〉的态度》之外，还刊发梁实秋《文学的纪律》^④一文，提出“文学里可以不要规律，但是不能不要标准。从事于文学事业的人，对于这个标准要发生一种相当的关系，那便是文学的纪律的问题”。文学之所以重纪律，是要求文学的健康。健康的文学在态度上“必须是严重的”，不是为了满足大多数群众的胃口；文学的力量在于“节制”，“以理性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这样才能表现“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人性”从而获得永久价值。梁实秋关于“文学的纪律”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新月〉的态度》所打出的“健康与尊严”旗帜的呼应。再比如，陈梦家编选《新月诗选》时所写的《序言》，也一直被视为新月诗派自我总结性的宣言：“我们自己相信是在同一方向努力的人。对于新诗，凭了自己（这少数人）算是指出一个约略的方向，这方向只是这少数人共同的信心。我们在相似或相近的气息之下禀着同样以严正态度认真写诗的精神（并且只为着诗才写诗），我们希望一点苦心总不会辜负自己……这诗选，打北京《晨报副刊·诗镌》数到《新月》月刊以及最近出世的《诗刊》并各人的专集中挑选出来的。”^⑤陈梦家在谈到《新月诗选》的编选意图以及关于新诗的主张时，处处用“我们”做主语，彰显了一种集体共识；同时，他也明确了“新月诗派”依托《晨报副刊·诗镌》《新月》《诗刊》等“同人期刊”一路走来的历程。

《新月》月刊的媒介运作、传播活动，比较典型地体现了现代中国“同人期刊”独特的传播功能、文化文学价值与社会历史价值。因此，以《新月》月刊与“新月派”关系为考察对象，能够概括“同人期刊”与流派生成、文学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方式。

其一，“同人期刊”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化以及话语权的获得，提供了重要的途径和方式。

① 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M]//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99-201，212。

② 耿云志。胡适年谱[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174-176。

③ 徐志摩。《诗刊》放假[N]。晨报副刊·诗镌，1926-06-10。

④ 梁实秋。文学的纪律[J]。新月，1928（1）。

⑤ 陈梦家。新月诗选·序言[M]。上海：新月书店，1931。

结群，是中国文人的生存方式之一。文人因志趣相投、会文谈艺而结合的团体自古即有，如晋代慧远结“白莲社”，唐代白居易与香山九老结“香山社”，宋代有“西湖诗社”，元代有“月泉吟社”。明代这类诗社或文社比历代更盛，“明代的读书士子，非常害怕独学无友，热衷于求学问友，所以在当时治学订盟的风气极盛。而一些文人士大夫，优游林下，吟风弄月，也喜欢结伴成群”^①。这种文人“雅集”最初以定期或不定期的集会为标志，其后则发展至通过出版作品集产生并强化与“社”名联系起来的团体身份的外在认知。晚清以降，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新型教育和新的职业道路的出现，文学活动和出版物开始呈现出越来越职业化、专业化的特点。文学杂志成为民国文学生产的主要媒介，“在现代，文学社团变得越来越不以事件为中心，而是以经营定期出版物和丛书为中心……通过这种方式，文学社团的成员彼此保持联系，并和局外的读者交流”^②。所以，证明民国时期文学社团或流派的存在材料，主要来自文学杂志。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社团或流派没有在集体名义下出版过任何文学杂志或文学作品，要想证明其存在几乎是不可能的。

社团流派的成立和与之相应的刊物的创办，是中国现代文学区别于古代文学的重要标志之一。从五四时期开始，就成为一个十分显著的现象。“这一时期，是青年的文学团体和小型的文艺定期刊蓬勃滋生的时代。从民国十一年（1922年）到十四年（1925年），先后成立的文学团体及刊物，不下一百余。”^③1920—1930年间，著名的文学团体负责了大部分新文学杂志的生产，文学社团以及它们的期刊遍及全国。这些杂志最大的价值是为青年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交流的渠道，“不论在中国舆论的发展方面，还是在中国新知识分子的形成方面，都是划时代的”^④。文学期刊变成了一个“实际的聚会场所”，为其成员提供发表或出版作品的渠道，并在文化圈子内保持团体的集体形象。

以“同人期刊”为媒介的集体性的文学活动发生在整个中国的各个层面。社团或流派凝聚并形成了同一群体成员间的共同体意识，这种意识由定期的杂志或其他出版物来强化。“这些文学社团和流派之所以成为文学社团或文学流派，又往往以一个刊物为中心而成名或得名。刊物在这里起了一种有力的组织作用。”^⑤社团流派与杂志出版这种相辅相成的模式，不仅“在现代知识分子文化空间的拓展和知识谱系的整体性传播中往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成为整

① 陈宝良. 中国的社与会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279-280.

② [荷兰] 贺麦晓. 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杂志（1911—1937）[M]. 陈太胜,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34.

③ 茅盾.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M] //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 影印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

④ [美] 周策纵. 五四运动: 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 [M] // 周子平, 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181.

⑤ 贾植芳.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序 [M] //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9: 1-3.

个社会文化现代传播的主要方式”^①。如“新月派”从编辑《晨报副刊》的《诗镌》《剧刊》，再到开办新月书店、主办《新月》月刊，以及后来创办《诗刊》、出版《新月诗选》，的确形成了一种整体性的面貌和特点，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令人瞩目的文化群体。

其二，“同人期刊”为中国现代社团流派乃至诸多文学现象的发生、流变，提供了多样化的平台、空间和动力。

范泉编辑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一书，他在前言中指出，这不仅是一本参考书，而且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表述形式”。民国初期文学社团、流派数量如此之多，集体性的文学活动在整个文坛如此普遍，着实让人惊叹！究其原因，由“同人文学”乃至“同人文化”所建构的现代中国文化生态是极为重要的背景。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社团和流派的界限是模糊的，常常会被混淆使用。因为大多数文学社团虽然有自己的结社名称和共同文学主张，但其“组织性”是非常弱的。“同人期刊”在文学社团和流派身份的构成上显得尤为重要，杂志的名称常常被读者和批评家用来指称社团或流派的名称。现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新月派”“语丝社”“现代评论派”和“京派”等，他们都没有明确的社团宗旨和运作章程，不过是一个个以刊物、书店等同人媒介为纽带的自由、松散的集合。在一个文人群体中，个体都有趋同的意识，群体的主张对个体无疑也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一份期刊的编辑宗旨一旦确立，就具有规范与制约的功能，但同时也提供了在共同旨趣下发挥个体特征、个体风格的一定空间。如尹在勤曾指出，把新月同人看作铁板一块有一刀切的弊端，“新月”是“派中有派”，对“新月”的派中之派进行区分有助于对它做实事求是的评价^②。闻一多及“四子”（饶孟侃、朱湘、杨世恩、刘梦苇）在新月同人中就自成一派，甚至有学者称其为“闻一多派”与“徐志摩派”，他们在艺术主张、思想境界等方面都有明显差异。《新月》月刊上发表的诸多政治理论文章，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前后也有变化，新月同人之间政治态度和思想观点的分歧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所谓“新月派”与左翼文艺界的论争中，梁实秋基本上是独立作战，他曾抱怨“《新月》的朋友并没有一个挺身出来支持我，《新月》杂志上除了我写的文字之外没有一篇文字接触到普罗文学”^③。应该说，梁实秋与左翼文学论战的立场是符合“新月”的方向与原则的，但新月同人鲜有“兴趣”参与到这场论战中，《新月》月刊也从未有意识地去组织有规模的论战。

“同人文学”乃至“同人文化”的这种松散性、非组织性，体现在文化文学生态上即为开放性和包容性，对于文化文学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在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现代建构中起着不可

① 俞晓霞. 从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到新月派：民国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态建构[J]. 学术月刊, 2014(11).

② 尹在勤. “新月”派中有派[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4(4).

③ 梁实秋. 忆新月[M]//梁实秋, 著. 陈子善, 编. 梁实秋文学回忆录. 岳麓书社, 1989: 109.

替代的作用。知识分子聚合在“同人媒介”周围，既强调个体自由的理念，又比较容易与其他个人或者群体因某一方面的共同爱好与趣味而进行联合，或者与其他团体在价值理念、政治主张、文艺思想和创作实践等领域展开论争，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价值观念多元并存的文化生态，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化文学社团林立、流派纷呈和文化文学运动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繁荣景象。

其三，现代中国“同人期刊”在现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想、传播乃至媒介形式的现代化转型和多元化发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历史角色。

从19世纪晚期开始，新的印刷媒介在中国出现并成熟，办一份报纸或刊物不需要繁琐手续、严格审批和大量资金，出版发行新刊物成为时代的风尚。这一文学时代的到来，以1902年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杂志为标志。现代报刊始终参与了现代文学的建构。刊物性质、办刊宗旨、编辑群体、受众层次等因素，都直接影响着现代文学流派、思潮的生成与走向，现代文学围绕现代报刊形成了复杂的文学场域。

“同人期刊”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并几乎成“尼罗河的大泛滥”趋势，对于现代文学的发展意义重大。在众声喧哗当中，中国现代人文团体呈现出明显的成员复杂、组织松散、活动时断时续、前后变化大的特点，这与作为团体聚合空间的刊物的同人性质有直接关系。“同人期刊”是社团或流派生成、发展的必要条件，“同人期刊”本身的局限性导致社团或流派的复杂化、非线性、多变性。一方面，以“同人期刊”为纽带的同人之间的聚合具有很大的松散性，这就给同人团体内部的不协调乃至最终的消散埋下了伏笔。人事的聚散往往直接影响到刊物的兴衰，刊物的前途和命运常常被一个人的去留所决定，办刊思想的彻底转变可能直接受一个人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同人期刊”以登载自己文人团体或流派的文章为主，封闭在一个相对稳固、狭小的作者群之内，目的是宣传某一种相近的文学主张，并未向公众开放言论空间，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读者的广泛性，刊物的发行数量和商业利润都极为有限。因此，从总体上看，“同人期刊”的发行时间都不会很长，或者会发生刊物性质的重大转向才能继续生存。

无论“同人期刊”的社会历史局限和历史命运问题如何显著，笔者认为胡风的一段概括是准确、有效的：“在新文学底发展史上，同人团体底战绩是很大的，抽掉了它，新文学史就差不多等于一张白纸。同人团体造成了养育作家刺激作家的环境，由于它们底活动，由于它们底工作底相衬或相成，才形成了一个进步的新文学传统，五·四的革命文学传统。”^①

^① 胡风. 文学修业的一个基本形态 [M] // 密云期风习小纪. 海燕书店, 1949: 65.